

内涵式发展导向下绿地嵌入城市规划的重构策略

于 红

青岛市社会科学院 山东 青岛 266071

摘 要：我国城市发展已进入内涵式增长新阶段，传统以数量指标为核心的绿地规划模式难以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本文在解析内涵式发展核心内涵的基础上，揭示了当前绿地嵌入城市规划面临的规划逻辑、空间布局、功能定位、实施机制四重困境，提出了价值、结构、功能、治理四维重构逻辑，并从规划编制、空间设计、技术支撑、制度保障四个层面构建了系统化重构策略。研究表明，内涵式发展导向下绿地嵌入的本质是从“配套附属”转向“空间骨架”，需要建立绩效导向、网络嵌入、复合服务、协同共治的新范式。

关键词：内涵式发展；城市绿地；绿地嵌入；规划重构

引言：我国城镇化已从高速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内涵式发展成为城市建设的主导逻辑。传统绿地规划以人均指标、绿地率等数量指标为核心，侧重于“有没有”“有多少”，忽视了“好不好”“用不用”，导致绿地分布不均、功能单一、效能低下等问题日益突出。本文从内涵式发展视角出发，系统分析绿地嵌入的现实困境，重构规划逻辑，提出系统性策略，为城市绿地规划转型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引。

1 内涵式发展对城市绿地规划的新要求

1.1 内涵式发展的核心内涵

内涵式发展是从“量的积累”转向“质的提升”的发展模式转型。在城市建设领域，体现为三个核心转向：从规模扩张转向存量优化，聚焦既有空间品质提升；从经济增长转向品质提升，优先关注人居环境与生态服务；从功能分区转向融合发展，强调空间复合利用与功能混合。对于城市绿地而言，内涵式发展要求绿地规划从“配套思维”中解放出来，不再将绿地视为建设用地附属品，而是将其作为提升城市品质、保障生态安全、服务市民生活的核心基础设施，在价值取向、技术方法、实施路径上进行系统性重构。

1.2 内涵式发展对绿地规划的三重转向

内涵式发展对绿地规划提出三重转向要求。价值转向：从“景观装饰”到“生态服务”，强调绿地在雨洪调蓄、热岛缓解、碳汇增益等方面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空间转向：从“边缘布局”到“中心嵌入”，通过见缝插绿、立体绿化等方式实现高密度建成区的绿地增量。方法转向：从“蓝图式规划”到“适应性治理”，建立“规划—建设—评估—调整”的动态循环机制，实现规划与建设、管理的有机衔接，使绿地系统能够动态响应城市发展变化^[1]。

2 当前绿地嵌入城市规划的现实困境

2.1 规划逻辑困境：指标导向替代绩效导向

当前绿地规划深受“指标崇拜”影响，人均公园绿地面积、绿地率等数量指标成为核心评价标准。指标导向存在明显缺陷：指标达标不等于绩效达标，分布不均的绿地系统虽总量达标，但服务覆盖率和市民获得感极低；刚性约束导致规划缺乏弹性，难以差异化设计。更严重的是，催生了“绿地搬家”“数据游戏”现象——将外围林地计入城市绿地拉升指标，或临时复绿应付考核。这种“为指标而规划”与内涵式发展倡导的“为绩效而规划”背道而驰，必须从根本上扭转。

2.2 空间布局困境：碎片化与孤岛化并存

城市绿地空间面临“碎片化”与“孤岛化”并存困境。碎片化表现为绿地斑块过于零散、规模不足，难以形成有效生态功能。高强度建成区可利用土地有限，规划只能利用边角地建设微型绿地，但缺乏有机联系，生态效益难以叠加。孤岛化表现为绿地与城市功能空间、绿地之间的割裂。道路、铁路等线性基础设施切割效应显著，生态廊道缺失导致物种迁移受阻、冷岛效应难以联动。同时，绿地与周边设施的衔接不足，降低了可达性和使用便利性，使生态和社会效益难以充分发挥。

2.3 功能定位困境：单一休闲替代复合服务

传统绿地规划将功能局限于“游憩休闲”单一维度，忽视多元复合功能。这导致两个问题：一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被低估，雨洪调蓄、气候调节等生态功能缺乏系统设计；二是与城市其他功能融合不足，难以成为活力发生器。市民对绿地的需求已升级为“可休憩、可社交、可运动、可文化”的多元体验，但多数绿地仍停留在“草坪+树木+座椅”的低配模式。同时，绿地与商业、文化等功能的融合不足，难以形成“绿地+”复合空间，导致

使用效率和吸引力不足,与内涵式发展要求的“高品质”存在较大差距^[2]。

2.4 实施机制困境:建设与管养割裂

绿地规划、建设、管养三个环节的割裂是制约绩效提升的深层障碍。规划阶段,设计人员对施工可行性和后期管养成本考虑不足;建设阶段,施工单位可能降低标准,导致“图纸很美、落地变形”;管养阶段,养护资金不足、责任主体不清,许多绿地建成后迅速衰败。此外,三环节分属不同部门,缺乏跨阶段信息传递和反馈机制,问题难以及时纠正。这种“前端重规划、中端重建设、末端轻管养”的格局,使绿地绩效难以持续,与内涵式发展要求的全生命周期品质管理相去甚远。

3 内涵式发展导向下绿地嵌入的重构逻辑

3.1 价值重构:从“数量达标”到“绩效驱动”

内涵式发展要求绿地规划从“数量达标”转向“绩效驱动”,建立以绿地服务效能为导向的评价体系。绩效驱动包含三个层次:生态绩效,即雨洪调蓄、热岛缓解、碳汇等方面的实际贡献;社会绩效,即对市民健康、休闲、社交等需求的满足程度;经济绩效,即对土地增值、旅游带动的促进作用。实现价值重构需建立“目标设定—方案设计—实施评估—反馈优化”的闭环机制,将绩效理念贯穿规划全过程,推动规划从“静态蓝图”转向“动态治理”,确保绿地系统始终朝着增进绩效的方向演进。

3.2 结构重构:从“孤岛斑块”到“有机网络”

破解绿地碎片化与孤岛化困境的关键是从孤立斑块走向有机网络,构建“斑块—廊道—基质”的生态系统结构。斑块层面,按照“大型绿地保生态、中型绿地保功能、小型绿地保覆盖”原则,形成分级分类的绿地体系。廊道层面,利用河道、道路等线性空间建设生态廊道,连接分散绿地,保障物种迁移和冷空气流通。基质层面,通过立体绿化将绿色渗透到建筑界面,提升整体绿视率。有机网络实现“1+1>2”的协同效应,使分散绿地通过连接产生整体生态功能,需从区域生态安全格局高度系统谋划^[3]。

3.3 功能重构:从“单一游憩”到“复合服务”

内涵式发展要求绿地从“单一游憩”转向“复合服务”,成为承载多元城市活动的复合空间。核心是“绿地+”模式:绿地+生态服务,通过海绵设施、乡土植物配置强化生态功能;绿地+健康服务,设置健身步道、康养花园满足健康需求;绿地+社交服务,配置社区花园、露天剧场促进邻里交往;绿地+文化服务,植入地景艺术、历史叙事强化场所精神;绿地+智慧服务,部署智能导览、互动装置提升体验。功能重构不是简单设施堆砌,而是基于

使用需求的组织创新,在“以人为本”原则下针对不同区位、规模、人群进行差异化设计,实现空间资源高效配置。

3.4 治理重构:从“部门分割”到“协同共治”

治理重构需从“部门分割”转向“协同共治”,涉及三个层面。一是纵向协同,建立“规划—建设—管养”全生命周期信息共享和反馈机制,形成持续改进闭环。二是横向协同,打破规划、园林、市政等部门壁垒,在绿地与海绵城市、绿道系统工作中建立联合机制。三是政府、市场、社会的多元共治,探索政府主导、市场参与、社会监督的绿地治理模式,通过PPP模式引入社会资本参与绿地建设和运营,建立社区参与式规划机制,鼓励居民认养绿地、参与维护。治理重构的核心是建立权责清晰、协同高效、可持续的绿地治理体系,为绿地绩效的长期持续提供制度保障。

4 绿地嵌入城市规划的重构策略

4.1 规划编制层面:绩效目标嵌入控规

将绩效目标嵌入控制性详细规划是实现价值重构的关键抓手。传统控规对绿地的管控主要停留在“地块边界、用地面积”等空间形态指标,缺乏对绿地绩效的约束。重构策略要求在控规中增加绿地绩效管控条款,具体包括:生态绩效指标,如年径流总量控制率、热岛强度削减值、乡土植物比例等;社会绩效指标,如步行15分钟公园覆盖率、设施配置标准等;经济绩效指标,如绿地与周边土地使用的功能兼容性要求。同时,建立“地块绿地率底线+绩效目标引导”的双重管控模式,在保证基本绿量的前提下,鼓励通过立体绿化、复合设计等方式提升绩效。绩效目标的设定应区分强制性指标和引导性指标,兼顾规划管控的刚性与弹性。此外,控规文本中应明确绩效评估的周期和责任主体,为后续实施监督提供依据^[4]。

4.2 空间设计层面:多尺度嵌入策略

空间设计是实现绿地嵌入的核心操作环节,需要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尺度协同推进。宏观尺度聚焦“绿廊嵌入”,依托城市通风廊道、河流水系、交通干道构建生态廊道网络,将外围生态基质引入城市内部,形成“绿楔+绿环+绿廊”的城市生态骨架。中观尺度聚焦“绿网织补”,在高密度建成区通过存量更新、闲置地利用、设施复合等方式增加绿地节点,并通过林荫道、滨水步道等线性空间串联,形成覆盖社区的绿色网络。微观尺度聚焦“绿点渗透”,将绿化嵌入建筑、街道、地块内部,包括屋顶绿化、垂直绿化、阳台绿化、街道绿地、口袋公园、雨水花园等。三个尺度应形成“宏观定骨架、中

观织网络、微观落点位”的协同机制,确保绿地系统在各层级空间中的贯通性。设计应坚持“最小干预、最大绩效”原则,优先利用存量空间,减少对既有建成环境的扰动。

4.3 技术支撑层面:数字化绩效评估与动态调整

数字化技术为绿地绩效的量化评估和动态调整提供了有力支撑。首先,构建城市绿地数字孪生平台,整合多源数据(遥感影像、GIS数据、手机信令、POI、环境监测数据),实现对绿地空间分布、使用情况、生态效能的全域实时感知。其次,建立绿地绩效评估模型,包括生态绩效模型(如InVEST模型评估碳汇、雨水截留等)、社会绩效模型(如基于手机信令的绿地使用强度分析)、经济绩效模型(如特征价格法评估绿地溢价效应)。基于评估结果,识别绿地的“绩效洼地”和“服务盲区”。最后,建立动态调整机制,将评估结果作为规划修编和设计优化的依据,对于绩效不达标的绿地提出改造提升方案,对于服务盲区制定新增绿地点位计划。数字化技术支撑下的动态调整机制,使绿地系统能够响应城市发展和市民需求的变化,实现从“静态蓝图”到“活态演化”的跃升。

4.4 制度保障层面:激励与约束并重

制度保障是重构策略落地实施的基础,需要建立激励与约束并重的政策体系。约束机制方面,将绿地绩效目标纳入土地出让条件、规划许可、竣工验收等环节,形成全链条管控。对于新建项目,明确绿地绩效达标要求,未达标不得通过验收;对于建成区更新项目,将绿地嵌入作为城市更新的强制性内容。激励机制方面,建立“绿色容积率”奖励制度,对实施屋顶绿化、垂直绿化的项目给予建筑面积奖励;设立绿地绩效专项资金,对绩效突出的项目给予资金补助;开展绿地绩效星级评定,将评定结果与政府考核、企业信用挂钩^[5]。完善公众参与机

制,建立绿地绩效信息公开平台,鼓励市民参与绿地监督和评估,将公众满意度作为绩效评价的重要维度。激励与约束相结合,既守住底线又激发活力,为绿地嵌入提供可持续的制度动力。

结束语

内涵式发展导向下绿地嵌入城市规划的重构,本质上是城市发展范式转型在空间规划领域的深刻映射。本文从价值、结构、功能、治理四个维度系统解析了重构逻辑,并提出了规划编制、空间设计、技术支撑、制度保障四个层面的操作策略。研究发现,绿地嵌入的核心在于从“配套附属”转向“空间骨架”,从“数量达标”转向“绩效驱动”,从“孤岛斑块”转向“有机网络”。未来,应进一步深化数字化技术与绿地绩效评估的融合研究,探索面向实施的全生命周期治理机制,让绿地真正成为提升城市品质、增进民生福祉的核心基础设施。

参考文献

- [1]陈士轩.内涵式发展导向下城市更新土地政策创新研究——以低效用地再开发为核心场景[J].租售情报,2025(10):111-113.
- [2]王董.以真实城市规划判断能力培养为核心的城市园林绿地系统规划课程教学改革探索[J].建筑与文化,2026(5):255-258.
- [3]王荣臣.存量发展背景下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的工程重构研究[J].建筑与施工,2026,5(6):56-57.
- [4]殷文或,邵大伟,吴殿鸣.居住空间分异对公园绿地空间格局的作用效应——以苏州市为例[J].地域研究与开发,2023,42(1):81-87.
- [5]岑伟,陈磊,周隽罡.基于谱系学视野的历史风貌街区改造以南昌绿地象南中心井象文化旅游街区为例[J].时代建筑,2021(1):160-165.